

张正明 张舒 著

果天数乎 抑人事乎

山西地方史探略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前言

果天数乎
抑人事乎
山西地方史探略



2003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20周年，曾要求时任研究员各出版一部著作，并将历年已经出版和发表的论文编为索引，以便查阅。当时笔者出版了《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附录有论著索引21部，论文索引80篇（包括译文5篇、书评报道等14篇），当时觉得此书也是对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次小结了。时光很快，不觉至今又是14年。笔者从2007年已经调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并于2009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已是进入耄耋之年的人了。人生苦短，乃自然规律，心态可可。为此，又整理出版了近年的一些研究文章，书名为《果天数乎，抑人事乎？》，这八个字，原为清末民初晋商李宏龄先生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之呼吁，兹借来作为拙著书名，是想沾点古人文字之光也。

拙著共收入论文50篇，其中包括历史人物、晋商研究、山西古民居寺庙建筑史、山西美术史、山西民间音乐舞蹈史、山西戏曲文明史、清代山西的土地买卖、清朝与琉球国贸易等。书中有个别文章在内容的引文上有重复之处，这是因为有几篇文章原为按照某个会议要求的讲话稿，若抽掉其中的这些引文内容，会不成文，只好保留原样，谨在此向读者说明。这次拙著也在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历年论著、论文索引，计各类著作45部（包括专著、编著、点校、译著、工具书），论文调研报告、译文、书评报道、序言356篇，以便查阅。

书中单列《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者——悼恩师著名学者秦佩珩先生》一文，是笔者对恩师秦佩珩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笔者走上明清经济史研究道路，秦先生是我的导师，是我的引路人，是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贵人，是我的大恩人。这篇纪念文章单列同拙著一起出版，是学生对老师的怀念，对老师的敬意。出版拙著《果天数乎，抑人事乎？——山西地方史探略》，也是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学向先生的汇报，我想先生在天上会看到的。

1989年6月29日，秦佩珩教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与世长辞了。前几天我还收到秦师的来信，说他准备参加8月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准备会后到忻州瞻仰元遗山墓，没想到竟发生了如此让人万分心痛的变故。秦佩珩先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领域里较早进行开拓和收获丰硕的一位著名学者。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曾奋力著写近百万字的《明代经济史》（上、下卷），得到郭绍虞、齐思和、邓之诚等史学家的赞赏。齐思和教授为之所写的序发表在天津工商学院《工教学生》杂志上，可惜这部书稿不幸在抗战南下时失落，造成了先生终生的遗憾。先生在大学教课之余，四十多年来先后发表明清经济史方面学术论文70多篇，出版有《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等专著，并撰写完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概论》《中国国民经济史讲义初稿》《中国经济史讲义》《边疆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物价研究》《中国经济评论》《中国史部目录学论要》《清代经济史稿订存》《南明史稿》《南诏史渊源论稿》《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保险学大纲》《货币学教程》《资本论研究讲义》等书稿。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特别是在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先生还十分重视对后辈的培养，他以“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关爱学生、支持学生。先

纪念文章 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者

悼恩师著名学者秦佩珩先生

果天教乎 抑人事乎

山西地方史探略



生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多次带领学生到东北等地学习考察。1985年，笔者首次习作《山西工商业史拾掇》出版时，蒙先生大力支持，在身体欠佳时仍为拙著撰写了“序言”，称：“乙丑夏，余大病方愈，又值酷暑如焚，正明同志将书稿整理完毕，行将付梓之际约写书序，余惜作者之刻苦努力精神，不泯灭于人间，则责不容辞，爱书数语，聊充弁言，挥汗如雨，文不成章，而此书之问世，如能对‘四化’建设稍有贡献，则又私心之所以冀幸也夫！”

先生十分关心山西的人文地理研究，先后发表的有关论文有：《五台山显通寺铜殿建置的比较研究》（《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山西襄汾丁村明清民宅建筑琐记》（《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清代晋商的发展性质及历史地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清代晋商之盐商和票号的再探讨》（《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简评〈山西工商业史拾掇〉》（《经济问题》1987年第11期）等。

先生出生于1914年，字少白，号宝楚，笔名莫问。祖籍江苏高邮，出生于山东安邱。1941年燕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天津工商学院、成都华西大学、成都川康农工学院、四川大学、光华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西安铭贤学院、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1956年受聘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探讨的课题之一。早在1962年，先生就在《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一文中独树一帜地提出，在十六、十七世纪，我国农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就十六到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来看，应该说是一个末期的封建社会，它和以往的封建社会不同之处，就是在它的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当时生产关系中就愈显得复杂了。”时有慕祁奚同志评论说：“若纵观全文，尤其是留意一下文中所引的上百种古今资料，你不难看出作者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站在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本着严肃求实的科学

态度，积多年之功，刻苦钻研而得出的。”^[1]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端》（载《晋阳学刊》1985年第5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的登上历史舞台，致使农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从隆万到乾嘉，形成一个马鞍形。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边疆史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家日益重视研究的领域，先生在这方面可谓识见很早，用功很勤。例如对东北经济史，他认为，无论从生产、边防、文化遗产、国际技术交流以及现实性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意义。先生曾三次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黑龙江外纪〉所反映的清代黑龙江社会经济》（载《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清初黑龙江社会经济的初步考察》（载《东北经济史论文集》1984年）等多篇论文。先生对云南边疆经济也很有研究，在《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一文中，先生对明代向云南移民和军民屯田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就明代云南的移民分为留戍、仕宦落籍、移民与谪戍、政治变动与逃亡、工商业者流寓、文人流寓、宗室藩封等七个方面，指出：人烟稀少的云南因移民而人口大幅度增加，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先生撰写的《明代滇贝巴小录》则填补了关于滇贝巴研究的空白，先生认为贝巴即贝的使用，贝巴在云南滞留很长时期，直到明清之际才予以废除。先生指出，这一变化是云南商品生产及交换的逐渐发展和明代后期货币经济取得重要地位的反映。

先生还十分重视对民族史的研究，《试论南诏史的研究》（《沈阳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有关南诏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南诏史中语言和宗教问题的探索》（《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契丹货币问题及探源》（《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中国史论集》1981年）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特别是先生关于南诏语言、宗教的研究，认为南诏虽然通用汉文，但由于系出羌族，文化上受汉族影响，所以在南诏语中外来语因素颇多。他还认为：南诏信道教，崇信三官，但不排斥佛教，并受到摩尼教影响。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和宗教界反

响很大，引起了重视。

先生治史兴趣广泛，凡水利、建筑、音乐、方志均有涉猎。这些方面的论文有《明代水利之研究》（《经济学报》1941年第2期）、《明代驿传的组织和管理》（《历史教学》1963年第11期）、《朱载堉与乐律全书》（《人民音乐》1963年第4期）、《论古方志的源流和体例》（《大学文科园地》1986年第1期）、《五台山显通寺铜殿建置的比较研究》（《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山西襄汾丁村明清民宅建筑琐记》（《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等，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值得一读。

二

先生说：“昔人诗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余亦正有此感。”^[2]先生一生非常注意关心学生，栽培后辈，经常把自己治学体会心得，人生应走的道路说给学生，充分体现了先生“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先生在《史舟习驶》（《编创之友》1983年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说：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必须通过一些科学的、有效的方法才能取得一点成果或效益。他认为，经济史研究首先是选题问题，题目选对了，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选题要有几个标准，择要而言：一是应当联系当前社会实际，也就是要处理好选题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应当填补史学上的空白。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有较少经验的历史研究者，填补历史上的空白问题，不宜抓过大、过宽的问题。而对于一个有较深修养的历史研究者，又不宜抓过小、过狭的问题。先生的这番话对于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史学界新人来说，可谓语重心长，经验之谈。

先生在治学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他已是著名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成就显著，但他十分谦虚。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一书的“跋”中说：“珩自维学识原至浅陋，后遭国难奔走西东，往日所搜集之史料，复于十年浩劫中如烟灰荡扫。今欣逢‘四化’建设，似亦不能不投砖献瓦，略尽绵薄。姑就记忆所及，于明清经济史事，溯其源流，启其关键，草成此稿，聊备覆瓿。称为稿者，盖不敢视为定本之意也。”

先生是一位异常勤奋的学者。他搜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文献、方志、笔记、文物等都广为收览。他说：“搜集资料，照我想来，所搜集的史料幅度还是愈广愈好。”^[3]为了搜集到更多的实地资料，国内河山史迹大都有过他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只身赴云南边疆，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西北和三次到东北进行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生是身体力行者。

先生说：“余嗜经济史近五十年，”^[4]故在治学上尤关心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经济史和历史学一样，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科学。”^[5]如何使中国经济史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走上新途径，早日结出丰硕成果，是先生近几年一直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问题，他先后发表了《我对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治学之道》齐鲁书社1983年版）、《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论东北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及经济史资料的编辑问题》（东北三省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等文章，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上述论文中，先生针对目前经济史学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并不能代替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经济史工作者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就是找出经济运动的固有规律，利用它为自己的一定目的服务。先生指出：要治好经济史，必须精通历史学 and 经济学，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有些治经济史的同志愿望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对头，他们只注意历史知识，而不注意经济资料，或者只注意经济资料而不重视历史知识。这样，想把经济史搞通、搞精，实在是“南辕北辙”。在研究方法上，先生主张必须先练基本功，能掌握基本概念，能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先生说：研究经济史不能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要从具体史实出发。先生特别对当时的一种不好的研究风气提出了批评，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希望引起注意。先生的这一看法，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恳切。先生说：“目前有一种风气极不好，那就是不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危险的。不懂或不精通马列主义，是无法把经济史研究好的，我们年轻时吃过这样一些亏的。有些同志认为史料即

史学，拼命搜集史料成为唯史料论的俘虏。他们不知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多的史料也是没用处的。必须有了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史料才能成为有规律的东西。有人读了多年书，不能够把井田制、名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的发展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治了多年史，不能把租庸调法、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制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为什么？问题就在于资料掌握很多，但是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这样就缺乏指导思想。材料越多越难统率，有了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一切资料就会是绳贯联珠，无少缺逸，不会像一团铜钱一样，撒得满地。”^[6]

当然，先生也不同意不重视资料，从原则到原则，从抽象到抽象的研治经济史的方法。他说：“那样的文章读来毫无事实，以空对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茫无所之，这也是不好的”。^[7]

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意见，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史研究的拓荒者。

三

先生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不仅对史学、文物考古、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颇有研究，很有造诣，而且涉猎文学研究和诗词创作，成就累累。例如：文学评论与考证《秋窗忆语》《勺园漫笔》《吴梅村江上诗考证》《桃花扇的历史背景》，散文《椰子集》，诗集《红豆集》《春蚕集》《喜竹楼诗集》，戏剧《沧海月明珠有泪》《琥珀集》，小说《埋剑集》《埋情记》，小品《海鸥集》，游记《岷山夜雨忆江原》，译著《英美法银行制度》《紫柏集》，等等。

先生说：“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正是先生一生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秦佩珩先生仙逝了，但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以先生为榜样，为推进明清经济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悼念。

张正明 原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2017年笔者补充修改部分内容

注释：

- [1] 慕祁奚. 明清经济史论稿评介. 郑州大学学报, 1985 (2).
- [2] 秦佩珩.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序 // 龚自珍. 己亥杂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 [3] 秦佩珩. 史舟习驶. 编创之友年期.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4] 秦佩珩.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序.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 [5] 秦佩珩. 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1
- [6] 秦佩珩. 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1
- [7] 秦佩珩. 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3.1

目录

果
天
数
乎

抑
人
事
乎
山
西
地
方
史
探
略



001	明代治世能臣王琼
014	张居正与晋商
018	漫谈明代“三绝”之一的大同婆娘
022	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029	明清晋商家族中的女性
035	明清晋商与关公文化
048	明清时期的山西潞绸业
056	明清晋商家规家风研究
065	明清晋商与中国商业文明
072	晋商之魂与晋商精神
076	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085	清代北方的国际商路
092	清代晋商的人力顶身股
098	清代的山西票号与广东
103	清代盐商朱立基案
107	清代河东盐池附近村民任曰用等盗挖堰工案
111	清代河东盐务的捐免充商
122	徐继畲与晋商
126	谈谈走西口的历史
132	走西口与闯关东
135	晋商与品牌
138	晋商精神与金融创新
146	晋商信用之道
149	诚信晋商与信用太原的建设
156	柳林《杨氏家谱》与话剧《立秋》
159	晋商诚信与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163	清代晋商乔致庸
168	晋商经营理念与精神
179	从二则清代档案史料看杀虎口与归化城
184	汉口山陕西会馆
189	从晋商企业汾酒集团案例看百年企业发展
195	山西古民居建筑与寺庙建筑文明史探略
202	山西美术文明史探略
209	山西民间音乐舞蹈文明史探略
214	山西戏曲文明史
222	商业文明与城市发展
225	话说女娲
227	中国传统的贤惠妇女
230	介子推与绵山
233	于成龙的思想理念与清初吏治
237	从一则史料看清王朝与琉球王国的贸易
240	清代嘉庆年间贾连城购地情况试析
244	中国最早参加的世博会
247	清代万里茶路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52	山西与丝绸之路
256	“一带一路”与山西
266	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与汾酒
271	中国商会与山西商会历史嬗变与社会功能
279	借鉴晋商经验 建设商业信用
290	对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几点建议
293	附录 张正明部分论著论文目录

一、家庭与身世

王琼（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别署双溪老人，山西太原府太原县（今属太原市晋源区）人。琼四岁能写楷书，五岁被太原府尹举荐为奇童，八岁能通《尚书》，成化十六年（1480）举于乡，成化二十年（1484）成进士。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曾任户、兵、吏部尚书。王琼所处时代，正是明中期宦官弄权、官员派系斗争严重，正德帝、嘉靖帝荒诞不经，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暴动到处发生，边疆地区民族矛盾激化，社会不靖时期。王琼以他的出色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励精图治，关注民间疾苦，妥善处置西北边事，维护安定统一局面，颇有政绩，被后人誉为“明代重臣”“治世能臣”。

王琼出身仕宦家庭，其祖先，元初有王子实居并州，子实生高祖王良，元时官居潞州（今长治）知州。元末明初，曾祖王伯聚由蚕石（今太原市晋源区姚村乡）迁汾河东岸柳林（今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居住。祖父王安生二子，长子永寿，永乐二十一年（1423）举人，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次子永亨，即王琼之父，字延庆，曾受业于明代大理学家薛瑄门下，天顺三年（1459）乡试中举，明宪宗成化年间曾任昌黎知县、隆庆知州，并建新宅于太原县城东街（今属太原市晋源区）。王琼母亲任氏，太原人，生子四：长子名瑶，次子即

明代治世能臣王琼



王琼，三子名玠，四子名珮。王琼生三子：朝立、朝翰、朝儒。

家庭世系（《太原王氏通谱》）如下：

子实——良——伯聚——安——永寿

└ 永亨——瑶

└ 琼——朝立

└ 玠 └ 朝翰

└ 珮 └ 朝儒

王琼从小受到父辈理学熏陶，读书务明体实用，不喜老生常谈，慨然有当世之务。成化二十年（1484）王琼登进士，时26岁。次年官授工部主事，弘治六年（1493）升任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出治漕河三年，又改户部，历任河南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擢右副都御史，治盐两淮入为户部右侍郎。正德三年（1508）转吏部右侍郎，改南京。正德七年（1512），补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正德八年（1513），进户部尚书。正德十年（1515），改兵部。正德十五年（1520），转吏部。正德十六年（1521），为言官交劾，谪绥德。嘉靖七年（1528），起复兵部尚书。嘉靖十年（1531），改吏部。次年卒。琼，前后仕宦计48年。

二、政绩有声

王琼为官一生，倜傥多大略，遇事敢为，敏练果决，居官所至有声，其政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治理漕河，干练有方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运特别重要，但由于吏治腐败，漕河事务管理很混乱。王琼负责漕运后，首先，整肃人员，核实人员编制，革除兼差，责河道专司本职。其次，稽核资财，杜绝贪耗。埽草是河防要料，但新旧混杂，堆积腐烂而无人过问，地方官却每年摊派，并趁机从中渔利，人民深受其害。王琼针对这一混乱状况，通过核实埽草储存量、每年实际需用量，量用而征，并严加管理，做到了草不积腐，民不困征。数年后，河防储备充足，每年所征埽草比过去减少十分之七，两年节

储银三万余两。此外，王琼为了管好漕务，不畏权贵。都御史议将漕务费用移补军粮，琼据理力辩：“河漕重务，费缺孰供？急征之民，民益病”^[1]，坚持不给。后来，该御史又挪移河防木材修葺学校，琼得知后又立即传檄县官，令其速将材料追回漕司，以保证漕务之需。王琼主持漕政以来，不仅刹住了漕务贪污浪费之风，并在漕务管理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漕务管理呈现出新的气象。琼督漕务时，对漕河河段长度，水闸远近高低，所用木材漕舟状况，都做过详细调查，并编著成《漕河图志》八卷。后来，继任官吏按志核查，竟毫发不差，对前任官吏之认真负责干练精神佩服之至。《明史·王琼传》曾称赞他“治理漕河，敏练著称”。

（二）明习国计，通晓所管事务

《明史·王琼传》载：琼“为郎时悉读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有盈缩状，及为尚书，益明习国计”。正德八年（1513），琼升任户部尚书不久，一位边帅总兵向户部冒领粮草，王琼亲自过问，琼屈指计算，这位边帅总兵所率军士多少，已领粮草多少，某仓储粮多少，某场储草多少，各地每岁输送粮草多少，边疆士兵每年采集青草多少，曰：“足矣，重索妄也。”^[2]总兵被王琼算得瞠目结舌，不得不佩服琼对边疆粮草情况了如指掌，只好对索求粮草事作罢。弘治十年（1497），王琼任户部郎中时，他曾针对当时各省财粮事务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提出了“四科十三司条例”。建议各省布政司设立四科：即民科，主管所属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瘠宽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度支，主管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用及赏赉禄秩之费；金科，主管调市舶鱼盐茶钞税课及赋罚之收折；仓科，主管漕运军储出纳料粮。王琼主张对这些事务明确职责，分而治之。王琼主持盐政时，整理两淮、长芦盐法。在要津设官巡查私盐，盐弊为之一清。又议“输法”“量科中盐法”“商人买盐法”。王琼勤于本职，通晓所管事务，能针对时弊提出对策，不愧是一位治世能臣。

（三）运筹平定宸濠之乱

明中期社会动乱丛生，而且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如正德

十年（1519）发生的宁王朱宸濠叛乱事件，就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处置不当，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动乱，使民众受难。在平定宸濠之乱的紧急关头，王琼定大疑，决大难，发挥了突出作用。

朱宸濠（？—1520），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见正德皇帝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乘，便图谋夺取皇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朱宸濠首先采取向宦官刘瑾行贿的办法，得以恢复王府护卫。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诛，朱宸濠行贿获得的护卫又被取消。正德八年（1513），陆完出任兵部尚书，朱宸濠与陆完素有交往，便请陆相助复卫。同时勾结正德帝所宠伶人臧贤与幸臣钱宁攀载金室于臧家，分馈诸权要。朱宸濠在陆完、臧贤、钱宁的帮助下，终于在正德九年（1514）四月又恢复了王府护卫。复卫后，朱宸濠更加恣意行事，“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图谋不轨”^[1]。朱宸濠见正德帝无子，“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统，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谋不发”。朱宸濠又通过贿钱宁“求其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正德帝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按异色龙笺是“所赐监国书笺”，朱宸濠得之大喜。时有太监张忠依幸臣江彬，与钱宁、臧贤等相倾轧不和。于是，太监张忠暗中向正德帝告密奏：“（臧）贤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4]。正德帝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驱逐宁王府派到京师之人。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肖淮奏宁王不轨，正德帝即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前往宁王府收其护卫，令还所夺民田。朱宸濠得知消息，知其子入嗣已经不可能，不轨事已经暴露，便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起兵叛乱。是年六月十四日以庆寿为名，宴请地方官。次日，地方官来道谢，宁王府侍卫数百人，包围了来谢官员。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监国。”^[5]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江西按察副使许逵等不从，皆被杀。参政王纶等同附。朱宸濠遂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十万，自率舟师，蔽江而下，攻安庆。宁王朱宸濠叛乱消息传到京城，举朝震惊。朝中百官，见宁王势大，“以致朝士归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6]。甚至有的官员，阴卜成败以定从违。而屹屹不惧者，满朝文武中独王琼一人。琼对众大臣言：“诸君勿扰，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贼旦夕擒耳”。^[7]

王伯安，即王守仁，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正德初年，以忤宦官刘瑾谪贵州龙阳驿丞累官鸿胪寺卿。王琼素奇守仁才，以为“朝廷有此等人，不与以柄，又将谁用？”在琼的举荐下，守仁得以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王琼主兵部后，早已料到宁王朱宸濠必反，乃申军纪，督查抚臣修武备，以待不虞。宸濠反，琼从直书房顷刻拟十三疏，对平定宸濠之乱，作了严密部署。例如：请下诏削藩属籍，正贼名；请敕南和伯方寿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部趋南昌，应天巡抚要存嗣镇京口，淮扬巡抚丛兰扼仪真。王守仁擒朱宸濠正如王琼之策。《王阳明（守仁）年谱》载：“先生平贼擒濠，俱王晋溪（琼）赞颂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结果，朱宸濠之乱，仅用43天就得以平定。在宸濠叛乱举朝慌乱的情况下，唯有王琼定大疑，决大难，镇静自若，运筹帷幄，得以迅速平乱，人民免遭涂炭之难。诚然，朱宸濠之叛乱不得人心，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但王琼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发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可笑的是，王守仁活擒朱宸濠后，却不敢报功，反而处境更困难。原来正德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御驾亲征，御林军到涿州，叛乱已平。正德帝要表现是自己作为大将军平的乱，故按住捷报不发，仍继续向南进军，军到南昌，王守仁也不敢献俘，担心抢了皇帝之功而遭谴，只好采取迂回办法，通过太监张永献俘。王守仁在呈皇帝奏表时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同时，在奏表中加入皇帝身边之人，说他们平乱战争中有功。这样王守仁才算了结平叛之事，未因此受罚，后来朝廷命他兼抚江西。

（四）妥善处置西北边事

有明一代，如何处理好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政权，而王琼在总制三边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琼世家太原，青年时见秦晋之民困于防边，父子离散，深痛惜之。正德十年（1515），琼任兵部尚书，时四方盗起，将士以滥杀斩首级报功，琼认为这是弊端。指出：“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议所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8]同时，针对边防问题，提出奏议多篇。正德十五年（1520），琼改任吏部尚书。次年，言官劾琼，琼免死戍边。嘉靖七年（1528）

琼已 70 岁高龄，因“边事方急”，又起复琼为兵部尚书、提督陕西军务、总制三边（延绥、甘肃、宁夏）。他赴任后巡视险要，考察古今，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北边防御鞮鞞之策。他指出：既曰设险，而又曰以守者，守不可无险，险不可不守，以前失险不守，致屡遭侵扰。为此，他提出“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占为先”。在守边地区挑沟挖堑，即按照地理形势设险修筑工事。具体办法是：从定边营口始往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止，开堑 210 里，筑墙 18 里；宁夏城五岔渠始，西至贺兰山枣儿沟止，开堑 34 里；南从黄河大坝始，西北至贺兰山嘴墩止，开堑斩崖 84 里；从环县西北响石沟始，西到靖虏卫花儿岔止，铲崖砌垒 636 里。上述设险守边法，节省劳费，起到了良好的防御功能。

对于西边之防御，王琼主张恢复边疆地区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和商业贸易。琼上书曰：“制御西戎……自汉以来，悉通中国，我朝自洪武、永乐通贡不绝，臣愿远法舜尧，敷德格苗，近守祖宗怀柔远人成法，以罢兵息民。”^[9]王琼一方面于洮、岷、河、兰之地，缮城堡，远斥候，广储蓄，严谨防备。当来犯时，沉重还击。另一方面，释放土鲁番马黑麻、虎力尔翁等，责以大义。王琼的防卫和怀柔并举的方针很快见到了成效。嘉靖七年（1528），土鲁番速坛满速儿，派员来贡。明廷允准。此后土鲁番牙木兰、帖木儿、土巴等皆来附。西域地方在王琼的苦心经营下，终于避免了长期的战争，使这个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得以过上安居生活。

由于王琼总制三边以来，“西服土鲁番，率十国奉约入贡；北捍俺答，经岁无烽警。及是……西陲无事”^[10]。河西四郡百姓，恐一旦琼去，再受战争之苦，“咸诣抚按镇守，乞为奏留”。于是，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巡按御史胡明善奏称：“奉皇上特起王琼而委任之，琼奉命驱驰，殚厥心力，息兵固圉，克状其猷。……兹甘肃阖镇军民，久居危苦之地，赖以少安，合辞恳臣，欲久留琼兹土，民情如此，臣等谨具实以闻。”^[11]

王琼所以能在边务上取得较大成功，基本上是他当时所奉行的“抚拒适当”方针符合当时实际的结果，王琼认为：对边事“顺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黷兵。天下事，唯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12]。由于王琼洞察边情，敢